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经济学家 茶座

总第十七辑



黄有光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

陈抗

资本家为什么要破坏资本主义？

赵泉

忽视的与不该被忽视的——《中国经济》评论

荆林波

「土鳖」照镜找反差

陈彩虹

管理深处是文化

熊秉元

以文会友（二）

汪丁丁

从我们的精神状况谈起

卢周来

「无根」的社会代价

朱玲

西藏农牧民健康保障调研札记

2004 · 3

山东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家

Economist

茶座

2006年11月11日

本期内容



童年的梦

◎聂辉华

孩童时期，我就特别喜欢听大人们谈天说地、煮茶论道。我常常迷恋于那些光怪陆离的传奇经历，欣喜于那些异彩纷呈的趣闻轶事，感悟于那些鞭辟入里的时政分析。可惜，那时大人们在茶桌上聊天，小孩子是不能参与的。因此我就常常倚在门边，或者蹲在离桌子不远的灶头，又或者躲在屋檐下，带着丝丝懵懂静静地品味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况味。那时的我，常常遐想：要是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和大人一样谈经论道，该多么好啊！

直到有一天撞进了《经济学家茶座》，看见天南海北的经济学人兴趣盎然地“饮茶品茗”、“谈经论道”、“学海无涯”、“他山之石”、“学问聊斋”、“经济评论”、“经济随笔”……我不禁沉醉其间，以致但逢开门必来捧场。童年的梦在我心中复苏，要是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位“茶客”，该是多么快意人生啊！

这样的机会说来就来。承蒙“茶博士”的古道热肠和诸位“茶客”看客的热心捧场，自己真的成了《经济学家茶座》的一位“茶客”。掐指算来，我从一位普通的看客到一位忠实的“茶客”，混迹《经济学家茶座》已然两载。真应该感谢“茶座”老板的经营有方和“店小二”的热情周到，使我童年的梦想得以成真。晚生小辈，以茶会师，自然不敢说自己的言论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在“茶座”，说者无心；既为“茶客”，率性而为。

佛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宇宙。“茶座”既是休闲，也是学问，还是人生。



经济学家茶座

(第 17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 明 善

副主编

刘 德 久

执行主编

詹 小 洪

责任编辑

董 新 兴

陈 丹 丹

聂辉华 童年的梦 /1

【学问聊斋】

黄有光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
透视镜? /4

陈 抗 资本家为什么要破坏资本
主义? /8

王建国 千万别把经济学家错当
管理学家 /13

赵 泉 忽视的与不该被忽视的
——《中国经济》评论 /16

李文溥 腥风血雨《教科书》/23

谢作诗 经济学方法论 /29

【学界万象】

荆林波 “土鳖”照镜找反差 /35

田方萌 暴力经济学与政治生态学
——小议吴思的治学思想
与方法 /42

【他山之石】

李晓峰 韩国信用卡想说爱你不容易 /5

相均泳 管理深处是文化 /51

陈彩虹 另外的世界和经济学家
——参加世界社会论坛
感想 /58

王信东 在韩国感受不同货币标价
的差异 /62

【经济随笔】

熊秉元 以文会友(二) /66



- 辛向阳 制度三变记/69
 胡培兆 安静是福/77
 汪丁丁 从我们的精神状况谈起/80
 梁小民 寓言中的经济学(续一)/83
 郑志刚 猴子的寓言/90
 董国政 打捞“文明的碎片”——汉字
 三题/92
 杨臻黛 会计的幸福感/96

【生活中的经济学】

- 江涌 经济学家对“性趣”的研究/98
 李艳飞 离婚也要看市场?——中美
 离婚率比较分析/102
 李风华 民企为什么也办社会?/105
 魏睿 “差价返还”不简单/109

【经济评论】

- 卢周来 “无根”的社会代价/113
 韩朝华 保护私人产权是保护大款吗?/118
 李中建 关于腐败的几个“定理”/122
 郭梓林 真的有损人不利己的制度
 吗?/126

【田野调查】

- 朱玲 西藏农牧民健康保障调研
 札记/129
 蒋中一 湖北省长阳县合作医疗的
 农户调查/140

【经济学人】

- 聂辉华 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146
 许成钢 自学与思考/1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17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8
 ISBN 7-209-03516-8

I.经… II.金… III.经济学
 -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第083669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2098901
 E-mail: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2098027 2098028 209802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1/32开

5印张 13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0.00元

2004/10/08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

●黄有光*

最近读到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句显然必须商榷的话（下详），引发对经济学用处的思考，愿和读者们切磋。

经济学是一副透视镜

我认为经济学是一副透视镜，因为用经济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原来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东西。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一副折射镜，让我们看到许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東西。一个简单的例子，税额增加，可以多抽多少税？直接的答案是：增税额乘以交易量。但简单的经济分析就要考虑到交易量会因税额之增加而减少。例如原来每吨的税额是 10 元，（有效课税）交易量是 100 万吨，总税收是 1000 万元。若税额从 10 元增加到 12 元，交易量减少到 80 万吨，总税收不是增加 200 万元，也不是增加 160 万元，而是根本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40 万元。

另一个较不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尚余生命的价值，直观看来，应该是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降低。但是，用经济分析，竟然可以得出，当利率相当高时（例如实际利率超过 3%），生命的（金钱）价值可能随着年龄之增长而大量增加（十多倍）。但是，生命的效用价值却依然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降低。这就造成生命的效用价值与生命的金钱价值之间的剪刀差，在公共政策上造成困惑——到底应该根据生命的金钱价值或是生命的效用价值来制定公共政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失误？

在 2002 年《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的一篇文

*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



章中，斯蒂格利茨说：“一个最重要的洞见——这在现在的观点看是显然的——是认识到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致扭曲，但把扭曲的数目极小化，并不会使整个税制所造成的总量纯损失极小化。”（第 341 页）这句话可说对四分之三而错四分之一。“把扭曲的数目极小化，并不会使整个税制所造成的总量纯损失极小化”，这一般是对的，尤其是当税收的行政成本不大时。“所有的税收都会引致扭曲”，这在研究税收的扭曲成本的文献中的多数简单模式的世界中大致是对的；但在所有现实经济中是大错特错的！

在上述简单模式中，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没有外部作用等，没有税收的市场经济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任何税收都有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其实，即使是在这假想的世界中，所有经济学家都会承认，必须要有税收来维持政府开支。在人（即使只是大体上）是自利的前提（而这是市场经济最优性的条件）下，市场生产的可能，就必须基于有治安等公物的存在。若已经存有某些非最优的税收，则再加上与原有税收有经济上的对冲作用的税收，就不但没有扭曲作用，反而有反扭曲，或改进效率的作用。这与上述斯蒂格利茨引文的后半部是相符的，但却和其前半部相冲突。但这（有点吹毛求疵）不是本节的要点。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的主要失误是，简单模式玩多了，忘了实际经济并没有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而存有许多外部作用。

第一，单单看经济生产与消费对生存环境的许多危害，就使多数税收从具有扭曲作用变成具有改进效率的作用。首先，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有教导，对污染等对环境有危害的活动进行抽税，有改进效率的作用。其次，即使不是对污染等对环境有危害的活动进行抽税，而是对一般的消费或收入征税，大体上还是有改进效率的作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生产与消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中间产品）地有很大的危害环境的作用。

第二，除了对环境的危害，另一种重要外部作用是人际相互攀比，包括相对收入或相对消费作用、炫耀性消费等。这种攀比，尤其表现在竞争高收入、升职、炫耀高消费等方面上，而很少表现在竞争高闲暇





上。这种倾向,在东亚地区尤其显著。结果人们拼命工作、挣钱、浪费。茅于軾说过,许多人用“违反道德的手段赚钱;用危害健康的方式花钱”。可以补充说,许多人赚钱与花钱的方式都同时是不道德与不健康的。收入税与消费税,使人们少工作、少挣钱、少浪费,与其说有扭曲作用,不如说有纠正作用。

第三,对钻石性物品(与炫耀性消费有关,但也与送礼、储值等有关)征税,也能提高效率。普通物品是其消费量影响效用,纯钻石性物品是其交换价值(价格乘数量)影响效用,混合钻石性物品是两者都影响效用。纯钻石性物品的需求线是双曲线,且价格上升不减少消费者的效用,因为若价格加倍,消费量减半而交换价值不变,因而应该课以重税。对纯钻石性物品的税收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都没有。征10万元税,不是造成13万元的总负担,而是零负担。[见《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年拙文]对,纯钻石性物品不多见,但混合钻石性物品到处都是。对混合钻石性物品征税,也能提高效率。而且,有些情形(当混合钻石性物品被消费到其内在的消费作用为负时,例如豪饮伤身),税收的负担是负的。政府征税,消费者得利。

第四,非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天生的累积的兽性与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的影响下,往往表现为极端的物资主义,例如牺牲对快乐更重要的健康、安全、家庭、朋友等,而去多赚几个不能真正增加快乐的臭钱。这也使收入税与消费税具有纠正作用,虽然其纠正能力不是很大。

第五,有些税收还有其他纠正作用,例如对汽车与汽油征税,不但有上述纠正污染与攀比的作用,还有纠正过分拥挤的作用。

综合上述各项可见,即使纯粹从效率出发,不看政府支出与提供公物的需要,也不看减低收入不平均的需要,也应该对收入与消费大量征税。我认为,可能除了北欧各国以外,世界各国的税收,不是失之太高,而是失之太低。北欧各国高税收高快乐,或有因果关系。几乎所有的税收(一些低效政府及像中国许多农村与地区乱收税的情形除外)都有纠正的作用,而不是都有扭曲的作用。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的失误大矣!

第六,即使考虑了上述各项后,税收还有一些扭曲作用,这是单单



从税收这一方面来看。除了少数效率非常低的政府，税收所得不是完全被丢进大海(或被贪官贪污掉)，而大体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以税收所得提供治安，则把税收与政府支出合起来看，大体上并没有扭曲作用。多工作一小时多赚 10 元当然比只多赚 8 元(2 元为收入税)的激励大，但这是只看税收的一面，没有看政府支出的一面。如果没有税收就没有治安，有税收就有治安，试想，你是比较愿意多赚有保障的 8 元，还是比较愿意多赚没有保障的 10 元？[详见 Kaplow 与笔者(Ng)在美国《国家税收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 1996 年与 2001 年的文章]

经济学是一副小孔透视镜

为什么像斯蒂格利茨这么有才华的经济学者，会有这么大的失误？这也许是因为经济学这副透视镜是小孔的。为了进行严谨与深入的分析，经济学者往往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没有外部作用等。对于一个基本模式，这些简单假设也许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但经济学者应该认识到，这使我们的透视镜变成小孔的，看不到实际经济中大量存在的外部作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理性等因素及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者除了用简单基本模式的分析，还应该把模式复杂化或一般化，引入较现实的假设。但这不能太多，因为它会使分析成为不可能。因此，当我们把简单分析的结论应用到实际经济时，就应该考虑到简单分析与实际经济的差异，而做适当的调整。这种能力，不见得是诺奖得主、数理大师、名牌教授就一定具有的，反而必须靠常理(common sense)，对其他有关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的认识，及对实际世界(包括历史与各国不同的情形)的观察与比较。关于其他有关学科，我认为进化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有很大的启示。这不只是对经济问题，对其他几乎所有有关人们的行为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启示，因为人也是一种动物，我们的行为受我们的基因的影响。其他如心理学、社会学等也应该有所助益，尤其是有关快乐的研究，经济学者必须注意，因为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所有有目的的活动，最终目标应该是快乐。



资本家为什么要破坏资本主义？

●陈 抗*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资本主义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大部分为私人拥有，生产活动和收入分配基本上由市场力量决定。所以，资本主义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不如自由市场经济来得顺耳，就像人们有褒企业家、贬资本家的倾向一样。

资本家会破坏资本主义吗？会的。靠自由市场经济起家的资本家其实也害怕资本主义，因而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资本主义。

就像安定的社会秩序是公共物品一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是公共物品。尽管这种机制给社会中的个人带来创造财富和实现经济自由的均等机会，却不是人人都愿意为维护和发展市场机制承担成本。作为消费者，他们希望消费品在竞争的压力下越来越便宜；作为生产者，他们则希望生产的产品不要受到太多的竞争和挑战。十分矛盾的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里衡量一家企业成功的指标竟然是它压制自由竞争的能力。市场占有率越高，品牌知名度越响，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有效，它就算越成功。具有破坏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动机的人还真不少。

奥尔森指出，既然市场机制是公共物品，一个理性的资本家就不会为了增进其阶级利益而无私地放弃个人利益。相反，他会选择搭便车，把精力用于追求其个人利益。在 2003 年出版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部新书里，拉詹和金格尔斯(Rajan & Zingales, 二者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前者目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进一

*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





步指出,资本家不但不屑于维护资本主义,甚至还会破坏资本主义。这些人也许以前有所成就,也许运气好,也许是继承了遗产。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面前,他们都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现在的竞争力。市场机制带来的竞争,对他们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这就是他们害怕市场的原因。这些经济上有权有势的人自然会拉拢和收买政治势力,借用政府的力量来阻挠市场机制的发展,压制竞争力强的对手,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做成了资本家的人可以利用其优势任意改变游戏规则,不让其他想做资本家的人成功。其结果使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变得不再自由。资本太集中、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太大,就会产生腐败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一小撮金融寡头和银行家控制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又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目的是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更多的资本剩余。因此,帝国主义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产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所处的时代,的确是资本主义垄断、腐败的时代。蒸汽机车和电报电话的发明、交通和通讯的便利扩大了市场。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企业进行纵向和横向整合,形成大型企业和寡头。伴随而来的是专业管理人员的涌现、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以及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防止经理另立山头,资本家牢牢控制资本,阻碍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发展。结果,资本为资本家所垄断,仅为少数人服务。

上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重新检讨资本主义。当时的主要思路和马克思一样,力求避免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防止资本家对体制和政策的变化进行干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而且这类研究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的影响最大。兰格建议以国有企业取代私有企业,以边际成本定价法取代市场价格。由于他在论证中采用了边际主义的方法,主流经济学家能够接受他的说法。但是,边际成本定价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没有人知道边际成本今天是什么,明天如何变化。兰格的方案因此没有被采用过。后来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制度以及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都试图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





义”这条路,但是也都不成功。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又先后出现三种新的建议。杨克 (James Yunker) 提出了以公共所有制局 (Bureau of Public Ownership, 类似于国资委的机构) 为中心的“务实市场社会主义”。斯道伯 (Leland Stauber) 提出了类似于新加坡政联公司的“地方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柔默 (John Roemer) 则提出了类似于日本城市银行结构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些“社会工程师”对各自的体制建议都有非常详细的设计。可是, 因为这样人为地变革社会成本极高, 没有人愿意做这种社会实验的“白老鼠”。

有趣的是, 在许多东、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又成了讨论的重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亚尔 (Gil Eyal) 和其他两位作者在 1998 年出版的《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 转型经济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主要中欧国家 (波兰、匈牙利、捷克) 建立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中, 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官僚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在资本家队伍来不及形成之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民主制度。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取代经济上不够发达、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产阶级, 努力纠正由上一代激进知识分子追求威权式现代化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另一方面,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起来的却是“只有资本家而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俄罗斯的“大私有化”创造了一小撮寡头资本家, 却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机制和民主制度。这些资本家通过对国有资产的掠夺获得初始财富, 然后进一步控制了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主要企业。例如, 在 1995 年末到 1996 年初, 俄罗斯用“债转股”的方式把 13 家与天然资源有关的国有企业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少数几家私人银行, 而这些银行都是由几个与总统关系密切的金融寡头所拥有的。13 家国有企业中有一家生产镍的公司叫诺里尔斯克 (Norilsk Nickel), 其年利润高达 20 亿美元。可是, 一家叫 Uneximbank 的私人银行仅用 170 万美元的贷款就换来该公司 38% 的股份。俄罗斯剩下的最后一批优良国有资产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下被公然掠夺!

当人们还在辩论资本主义是否一定要有资本家的时候, 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和列宁的时代大不相同。例如,





在 1929 年，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 0.01%，其收入的 70% 来自红利、利息、租金等资本收入。到了 1998 年，资本收入的百分比下降到 20%，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和创业收入。以前，资本仅为少数人所拥有。现在，一般老百姓都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融资。稀缺的不再是资本，而是赚钱的点子。用拉詹和金格尔斯的话说，美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始出现了一场金融革命。

拉詹和金格尔斯以一个实例来说明金融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1993 年，一位叫凯文的年轻人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他不愿意给别人打工，想入非非地要自己当老板。问题是，凯文自己没有钱，也没有富爸爸。寻索基金(Search Fund)能够帮助凯文实现他的梦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向寻索基金筹到 25 万美元作为寻找投资机会的经费和报酬。一年半后，凯文找到了一家不起眼但极具潜能的道路——紧急服务公司，并说服寻索基金投资者和银行以参股的方式出 850 万美元买下这家公司。在凯文的精心经营下，公司的营业额从 1995 年的 600 万美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2 亿美元。凯文这时以每股 115 美元从寻索基金投资人那里买回他们当初以每股 3 美元买下的所有股份，成为真正的老板。拉詹和金格尔斯满怀激情地说：“寻索基金预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界的到来。在这个新世界里，一个人创造财富、获得经济自由的能力取决于他创意的质量，而不是他在银行里存款的数量。”

这是一条新的思路。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简单地由国家集中控制资本，以国家垄断对付资本家垄断，而是让资本为民众服务，排除阻碍人们致富的主要障碍，以竞争打破垄断。这是一种协调民众激励与社会目标的方法，它能调动亿万人的积极性，在动态中求平衡。反过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就像是一场没有运动员的竞赛一样乏味和滑稽。它扼杀了人们参加竞争的积极性，无论起点如何，最终还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让资本为民众服务是金融革命带来的进步。那么，产生这场金融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知识更新、技术进步与全球化。首先，知识更新来源于学术界的新发明。例如，组合投资理论、布莱克-修斯-莫顿(Black, Scholes, Merton)的期权定价法、金融衍生物的出现，使





金融机构能够推出分散风险的金融产品,提供风险管理的新途径,进而降低了融资的风险回报,使融资更加方便。其次,随着电脑和网际网络的发展,金融机构能够对潜在客户的信息有准确和及时的了解。只要输入驾驶执照号码便可以立即查到个人的信用指数。这就大大减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技术进步促进金融革命的另一个事例是银行管制的改变。在上世纪初,美国的许多州都有不允许外州银行来本州开设分行的法律。这是因为银行资本家财大气粗,是竞选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施展影响力,在州议会轻而易举地通过对自己有利的保护主义法律。这样的法律得以延续,一直到当网际网络和电子提款机的出现使银行业务不再受距离的影响时,外州银行的竞争才迫使本州银行认真面对竞争。由于管制不再起作用,各州在 90 年代相继废除禁止外州银行开分行的法律。产生金融革命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加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直接挑战不透明、不可及、决策保守、保护有问题关系客户、歧视圈外人的关系融资体系。

拉詹和金格尔斯进而指出,当权者在两种情况下愿意发展和完善市场机制:一是对自己有利时,二是迫不得已时。因此,财富的初始分布,新市场、新知识、新技术的出现,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等都是市场机制的发展机遇。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资本家总是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市场机制的发展。况且他们的努力在经济衰退时最容易成功,因为他们可以打保护失业工人利益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破坏自由市场经济。

奥尔森在《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拣》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裕的根本因素是体制和政策。可是,奥尔森没有进一步阐述好体制、好政策是怎么来的。拉詹和金格尔斯对体制演变进行分析,迈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



千万别把经济学家 错当管理学家

◎王建国*

人们常把经济和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混为一谈，其危害甚大。其实经济并非管理，经济学并非管理学，经济学家并非管理学家。

经济学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去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研究市场制度下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研究市场的协调性，研究市场的缺陷和失败，研究用怎样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规范企业的行为以解决这些问题，达至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比如，垄断破坏社会总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打破垄断，保持充分竞争。所以经济学家提倡自由竞争而反对垄断。相反，管理学研究企业在给定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的约束下，怎样的企业策略和企业

行为才能使企业的利润最大；研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诸如财务、营销、管理、会计、运筹、管理经济学、组织行为等）如何提升企业的垄断。可以说企业管理所研究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增加垄断，因为没有垄断就没有利润。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赢利。经济学家是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拉平，管理经济学家则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变陡。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不高，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如果要从计划转向市场制度，怎么办？怎么改？而作为管理学家，他关心的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得最好；在市场制度下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得最好；在从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

*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研究生院和经济系教授。





怎样才能做得最好。企业不能改变宏观环境，而只能在给定的宏观环境下，找到使得企业赚钱获利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所以严格地说，经济学所研究的那些变量，对于管理学而言，都是外生的变量，是当做常量去看的。

值得一提的是，制度经济学往往把制度当自变量，把生产力当因变量。我们过去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恰恰是相反，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经济学家只能告诉企业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环境，而管理学家则会告诉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谁是你的竞争对手，谁是你的目标顾客；怎样跟你的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怎样在这个市场上赢得你的目标顾客。像这些都是企业管理要回答的问题。

总之，经济学寻求最佳游戏规则提升竞争以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管理学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下寻求策略提升垄断以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强调抽象、一般和科学，管理学强调具体、特殊和艺术。

可见，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研

究目的上是相互对立的，手段上是非常不同的。不少企业把经济学当成管理学，把经济学家当成管理学家，把经济学家请到企业去用管理国家经济的方法诊治企业，而结果是，不少经济学家的良方常常使他们大失所望。其实，一般来说，企业要咨询的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这种现象说明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在市场定位上发生了错位。

为什么产生错位？

第一个错位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错位。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学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是政府命令的执行人，一切都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的。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去为社会的利益考虑，它不过是整体利益和安排中的一个棋子，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是一致的，是站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需要管理学家。

一旦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自由市场，企业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就变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了。企业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





是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此时企业就需要大量的管理学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观念滞后，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站在他们利益一边的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管理学家。而企业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表，为自己想办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么企业找谁呢？他只知道有经济学家存在，就会找这些经济学家。

第二个错位是经济学家本身的错位。

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他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到企业有利可图。既然企业请他，为什么不去呢？但是经济学家的错位在于，他跟企业提出的那些东西时，他也没有认清企业的位置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样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经济学家原来只是替政府想怎样规范企业行为的办法，而现在企业要问他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么才能利益最大化！有些经济学家就告诉企业应该满足政府要求，比如

克制自己的垄断能力，这样它还有什么利润可图呢？企业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怎么尽是教些自己危害自己的办法呢？

第三个错位是政府误导的错位。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道德观念的错位。政府过去对国有企业的那些要求，自然而然地被承袭过来去要求私有企业。认为企业在政府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私有企业的行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样。这种要求很明显是一种错位。

政府应该做的是怎么想办法规范企业的行为，怎么改变企业运行的环境，使企业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政府只能去规范企业的行为，而不能去改变企业的目的，让企业只为政府的利益着想。每一个企业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政府不能要求一个企业为了它的利益不去赢利而去破产，这是极端错误的。

